

#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巴基斯坦文化挑战

钟智翔 孔 亮

**摘 要:**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深受中巴双方的重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巴基斯坦民众在民族认同、思维方式、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与宗教关系等方面与中国差异较大,导致中巴经济走廊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来自文化方面的挑战。只有认真研究中巴文化差异,才能有效应对挑战,顺利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关键词:** 文化; 影响;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图分类号:** G13/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2-0044-07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于2015年4月20日正式启动。该项目被誉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深受中巴两国政府重视。项目启动五年来,推进效果不甚理想,面临着重重挑战。为了揭示其背后原因,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重点分析巴基斯坦文化,特别是民族认同、思维方式、政治制度、政教关系等方面的特性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挑战。

## 一、巴基斯坦民众的民族认同特性影响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进度

文化经济学认为,文化通过对某一区域中人们的精神和心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导致其经济的改变。<sup>①</sup>认同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社会力量。<sup>②</sup>民族认同是个人对其所属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定,是民族文化通过自我想象和集体记忆而实现的一项重要功能。<sup>③</sup>历史上,巴基斯坦一直是外族入侵南亚次大陆的首选之地,多种文明在此碰撞,本土文明进程常被打断。不同族群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对文化共

同体的自我想象各有不同,其族群的“多元性”远强于“一体性”。

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sup>④</sup>,其实质是宗教民族主义。巴基斯坦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满足南亚次大陆穆斯林保护自身文化的需求。穆斯林是巴基斯坦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在该身份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国家对民众的意义下降了,民众对“巴基斯坦人”这一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同弱于对其族群身份,如旁遮普人、普什图人、信德人、俾路支人等的认同。认同与共同命运观直接联系在一起,认同程度的高低反映了一个人对该群体的命运或遭遇的关心程度。<sup>⑤</sup>由于巴基斯坦人的民族认同弱于族群认同,民众对国家缺乏一致的忠诚,因此追求本族群利益最大化成为工作的基础。这就导致代表族群利益的政党、团体在经济建设中经常违背国家整体逻辑行事,从而阻滞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2015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出现的中巴经济走廊“东、西线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巴基斯坦政府力推的东线从瓜达尔出发,经卡拉奇、苏

**作者简介:** 钟智翔,男,湖南邵阳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南亚、东南亚问题;孔亮,男,河南济源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讲师,研究方向为南亚问题。

库尔、木尔坦、费萨拉巴德、伊斯兰堡、吉尔吉特进入中国。由于该线路几乎绕过了俾路支省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简称“开普省”），所以遭到了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们以俾、开两省发展权遭到忽视为由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致使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于5月28日召开全巴政党大会协调各方立场。最后政府决定设置东、中、西三线，并承诺优先完成西线建设，才使争议暂时得以平息。

中巴经济走廊的西线始于瓜达尔，经俾路支省的图尔伯德、旁吉古尔、纳格、巴斯玛、索拉巴、卡拉特、奎达、基拉·赛福拉、佐布以及开普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和哈桑·阿布达尔，最后抵达伊斯兰堡。虽然西线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俾、开两省族群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但也使二者高度关注西线建设的实际进展。而围绕线路的争议也一直没有结束：从具体路线到公路规模、从融资渠道到建设进度，凡是与计划、承诺有出入的事项都成为俾路支、普什图民族主义者质疑公平性的理由。

2016年9月，俾路支民族党（Balochistan National Party）主席阿赫塔尔·门加尔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只考虑了旁遮普省的利益，统治者对俾路支省的发展毫无兴趣，剥夺了较小省份的权益，俾路支人不接受基于欺诈的发展。<sup>⑥</sup>2018年12月21日，俾路支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成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来处理走廊项目和资金分配不当的问题。俾路支民族党议员萨纳乌拉声称，走廊99%的投资流向了东线，俾路支省遭到了忽视。<sup>⑦</sup>普什图民族人民党（Pashtunkhwa Milli Awami Party）则着力强调西线的“优势”。该党认为，东线夏季面临季风雨和洪水威胁，冬季受雾霾影响，西线全年适合通行，且发展西线有助于形成新的人口中心，能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该党还认为，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分别代表开普省和俾路支省，是走廊建设中的利益攸关方，二者应发起联合维权运动。<sup>⑧</sup>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因为身份认同的片面性，缺乏大局观，分散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精力，导致走廊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阻碍了项目的推进。

## 二、巴基斯坦民众的思维方式特性挑战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效度

巴基斯坦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受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欧洲文化影响。巴基斯坦精英阶层崇尚西方文化，其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注重个体性和逻辑性上。个体性思维认为个体可以分割，分割后的部分彼此独立、互不牵制，而逻辑性思维则较为重视运用规则和法律处理矛盾。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一方面渴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能给俾路支人带来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担心走廊建设会有负面效应。在走廊建设中，眼光也只局限于俾路支一省，不考虑走廊建设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俾路支省前首席部长、民族党（National Party）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总结了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对走廊的五点关切：1.瓜达尔港对俾路支人身份认同和该省人口构成的影响；2.瓜达尔港收入的流向；3.瓜达尔港的控制权；4.俾路支人对省内工作岗位的优先获得权；5.俾路支人对省内生意的独享权。<sup>⑨</sup>

长期以来，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希望实现俾路支省的自治和省政府对本地资源的控制。他们坚持瓜达尔港首先属于俾路支省，其次才属于国家。他们不满意大量外省工人参建瓜达尔港，认为外省劳工不仅剥夺了俾路支人的工作机会，而且会改变当地的人口比例，使俾路支人成为少数族裔。他们反对给外省劳工提供本地长居证明，要求通过立法限制外省人的土地所有权和选举投票权。他们对瓜达尔港的收益分配方式也表达了不满。很多俾路支民族主义者认为，旁遮普人主导的官僚机构会利用票决的方式批准有利于旁遮普省的方案，剥削俾路支省。基于这种认识，俾路支民族党在2018年的竞选宣言中表示，要捍卫俾路支人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合法权益，会采取措施使俾路支省政府收回对瓜达尔港的控制权。<sup>⑩</sup>

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十分关注走廊的透明性。民族党参议员卡比尔·穆罕默德·沙希称：“尽管我是参议院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的成员，但对走廊

协议一无所知。由于不确定俾路支省的收益,所以我不称中巴经济走廊。”<sup>①</sup>观察人士由此确信,俾路支省的走廊项目缺乏透明性,省内的既得利益者关注掌权和敛财,与中央政府勾结。部分俾路支民族主义人士则认为,瓜达尔港的规划应当公开,相关项目应在省议会和媒体上讨论。<sup>②</sup>

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还把省内走廊项目视为本省财产,希望借此迅速提高本省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忽视了走廊的整体性、宏观性和效益的长远性,导致对走廊的失望情绪及由此产生的被剥夺感逐渐在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中蔓延。特别是在早期收获项目陆续完成后,这种迹象更加明显。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关注该省在走廊中所占份额和西线建设进度,频频通过媒体质疑、议会提案、游行示威等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压,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做出调整和妥协,降低了中方投资者的热情和走廊的经济效益。

### 三、巴基斯坦的政治制度特性增加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难度

当代社会主要有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制度。政府配置资源制度是指通过政府的指令或政府制定的计划进行宏观调控,配置资源。<sup>③</sup>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民主宪政体制可以为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相应的政治框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sup>④</sup>受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巴基斯坦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但其议会制度一直为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部落血亲关系的家族政治所左右,具有明显的“自私性”和“地方性”特点。<sup>⑤</sup>家族政治与聚居型多族群结构的结合使巴基斯坦政党具有地域化、族群化的特征,省际边界基本上就是族群和政党的分界线。巴基斯坦的几个全国性政党分别是不同省份和族群利益的代表。这些政党在职务任命、政策制定、公共福利等方面向本地域和本族群倾斜,从而形成了政党与选民之间规律性的投票模式和稳定的政治认同。<sup>⑥</sup>由于旁遮普人约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63%,所以该国政坛呈现出“旁遮普一省独大”的局面。其他省份,特别是俾路支省,对议会民主制产生了怀疑。这导致一系列政治性问题接踵而至,对走廊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按照中方设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主要依靠国家间的合作进行,双方的中央政府是合作的主体。然而,带有家族政治色彩的巴基斯坦民主制度使中央政府既容易被地方利益集团裹挟利用,又容易受其攻讦。执政党难以真正代表国家意志,导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成了不同政治势力博弈的平台。

2016年下半年,在野的正义运动党就利用走廊建设的线路之争打击执政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质疑时任总理的纳瓦兹·谢里夫把高速公路从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移到了旁遮普省,而该省正是谢里夫的故乡和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最重要票仓。<sup>⑦</sup>伊姆兰·汗还批评巴基斯坦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没有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给予开普省应得的份额。<sup>⑧</sup>

家族政治与民主制度的捆绑还加剧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倾向,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没有安全保障。在巴基斯坦,俾路支人没有全国性政党,无法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排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俾路支人中的影响力逐步上升,导致部分俾路支政治组织只考虑族群利益,怀疑、排斥以旁遮普人为代表的外族人,甚至寻求俾路支省脱离巴基斯坦。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在难以左右中央政府决策的情况下,谋求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压来博取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先验性地把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预判为侵犯和控制,报以防范、挑剔、抵制和反抗。<sup>⑨</sup>分离主义势力更是将“反中国”同“反旁遮普”等同起来,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如今,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几乎一致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们认为瓜达尔港的建设与开发损害了俾路支人的政治和财政自主权,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视为掠夺俾路支省资源的阴谋。俾路支解放军对中国企业和中方技术人员抱有敌意,反对开发瓜达尔港。

近年来,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发动了多次针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袭击。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的联合。2018年11月10日,几个主要的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结成了“俾路支兄弟联盟”(Baloch Raji Aajoi Sangar, BRAS, 即“布拉

斯”)。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团结、整合民族力量使俾路支省脱离巴基斯坦。为此他们将巴基斯坦军队和中巴经济走廊视为袭击目标,已在中巴经济走廊西线的必经之地发动了数次袭击:2019年2月17日,一伙布拉斯武装分子在旁吉古尔县袭击了巴基斯坦边境部队,导致4名士兵死亡;2019年4月18日,一伙布拉斯武装分子伪装成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在位于瓜达尔县奥尔马拉镇的莫克兰海岸高速公路上拦截车辆,袭击乘客,导致14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巴基斯坦军人。<sup>⑩</sup>“奥尔马拉”袭击事件对俾路支省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迫使巴基斯坦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在莫克兰海岸地区的安保措施。

中巴政治制度的差异使双方民众对“先富”和“共富”产生了不同理解。巴基斯坦受家族政治左右的议会民主制度使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俾路支省和开普省陷入了困境:不投入发展力量或投入较少要面临不平等的指责,大规模介入发展则面临阴谋论的批评。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如何拿捏好分寸是一个难题。

#### 四、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特性增加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变数

政教关系可以被简述为一国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渊源、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不同,世界各国政教关系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是基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逐步建立起来的,总体上表现出政治与宗教互相介入、互相支持的特征。

在“两个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南亚次大陆出现了与印度教教徒相区别的穆斯林民族。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将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原则相结合,为建立巴基斯坦提供了合法的政治依据。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各族群、各派系身份认同的基础,坚持伊斯兰属性是巴基斯坦保持与印度的差异性,防止被其同化和归并的最佳选择。<sup>⑪</sup>因此,巴基斯坦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为之提供法律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伊斯兰政治文化得以与巴基斯坦的宪法制度和多元政治生态相协调。<sup>⑫</sup>伊斯兰政党积极

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通过施加政治影响维护社会生活中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例如,基于伊斯兰教的重要地位,巴基斯坦制定了《反亵渎法》。根据该法,亵渎伊斯兰教先知和教义的行为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惩罚,最高可判处死刑。《反亵渎法》得到了伊斯兰政党的大力维护和支持,成为矛盾双方互相攻击的武器。2018年11月,“巴基斯坦拉拜克运动”(Tehreek-i-Labbaik Pakistan)<sup>⑬</sup>及其支持者就以基于《反亵渎法》的判决被推翻为由发起反政府示威游行。示威者封锁了包括伊斯兰堡在内的几个主要城市的道路,导致部分地区陷入瘫痪,迫使政府妥协。

中巴两国在政教关系上的区别显而易见,导致在巴华人在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且缺乏规避意识的情况下可能会触犯禁忌,进而被宗教政治势力利用,酿成政治纠纷。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巴基斯坦,其言行举止与当地人文习惯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可能放大个别现象,破坏在巴华人的整体形象,将文化矛盾上升到政治层面,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增加不确定性。

伊斯兰政党对巴基斯坦政治的深度介入也给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增加了变数。2015年“5·28”全巴政党会议结束后,巴基斯坦成立了一个多党派参与的国会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推进,并向政府提出有关加快项目进度、降低成本、增进公共福利的建议。委员会设21个席位,其中两席由伊斯兰神学者协会所有。尽管该宗教政党支持中巴友好,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但在具体问题上还是影响了走廊建设的正常开展。例如,该党主席法祖尔·拉赫曼于2016年1月公开指责巴基斯坦政府违反了其在全巴政党会议上的承诺,改变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初始规划,以此呼吁开普省首席部长针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走廊项目得到优先实施而提出的异议。

#### 五、迎接文化挑战,助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为经济发展提出的,但其

内容并不局限于经济发展。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走向互利共赢,的确值得深思。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要了解巴基斯坦文化,增强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针对性。民心相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为了顺利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我们要弄清巴基斯坦文化概貌,在规划项目时进行文化风险评估,规避走廊建设中的文化风险。顶层设计上要主动调整思路,因地制宜,考虑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分布的平衡性,细化项目实施计划,推动合作模式的多样化。要鼓励双方地方政府、公司企业进行互利合作,力求优势互补,风险共担。

二是要加深观念认同,增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文化互信。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就是对文化包容的一种诠释。巴基斯坦文化所属的南亚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外缘性的伊斯兰文化,最大特点是“融合性”。两国文化都有接受异文化养分,主动进行文化更新的传统。因此,中巴双方应努力探索文化共性,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努力拓展共性观念,增强价值认同,求同存异,降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文化风险。

三是要加强中巴文化交流,夯实理解基础,扫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文化阻力。文化交流的关键在于多层次推进。要加强中巴双方的文化交流,探索符合时代的交流形式。双方要推动各级领导的互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通过举办文化博览会、建设文化交流中心、举办文化节等活动,激发互相了解的兴趣,增进友谊和文化理解。双方还应深化教育合作,在加强现有孔子学院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资助巴基斯坦学生来华学习的力度,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培养后备人才。在保持官方交流的同时,要有的放矢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在巴基斯坦基层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树立中国在巴基斯坦民间的正面形象,增加其对华好感度。

总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双方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瓜达尔港开发、中巴能源合作、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一批早期项目的建成,

带动了巴基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下一阶段,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向民生领域拓展。我们相信,随着中巴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多层次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巴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挑战将会得以消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巴基斯坦对“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大。

#### 注释

- ① 宋琪、占绍文:《文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第177页。
- ② 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8,第201页。
- ③ 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0页。
- ④ “两个民族”理论是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首先提出的,后经伊克巴尔、阿里·真纳等人丰富、发展而逐步成熟。该理论认为,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是不同的,是独立的宗教和文化实体,从而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
- ⑤ 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8,第276页。
- ⑥ Abdul Wahid Shahwani. Mengal likens CPEC to Kalabagh dam. (2016-09-05). <https://www.dawn.com/news/1282166>.
- ⑦ Syed Ali Shah. Balochistan Assembly adopts resolution against meagre provincial share in CPEC. (2018-12-21). <https://www.dawn.com/news/1452812>.
- ⑧ The Express Tribune. Pashtun Baloch key stakeholders in CPEC: PkMAP lawmaker. (2019-03-25). <https://tribune.com.pk/story/1936523/1-pashtun-baloch-key-stakeholders-cpec-pkmap-lawmaker>.
- ⑨ Safdar Sial. CPEC in Balochistan: Local concerns and implications.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9:9.
- ⑩ Shahid Saleem. BNP-Mengal vows to ensure people's rights in CPEC. (2018-07-02). <https://www.dawn.com/news/1417366/bnp-mengal-vows-to-ensure-peoples-rights-in-cpec>.
- ⑪ Adnan Aamir. The Baloch's concerns. (2017-12-31). <https://www.thenews.com.pk/tns/detail/564674->

balochs-concerns.

- ⑫ Safdar Sial. CPEC in Balochistan: Local concerns and implications.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9:11.
- ⑬ 厉以宁:《文化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8,第124页。
- ⑭ 宋琪、占绍文:《文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第179页。
- ⑮ 王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载郭业洲:《“一带一路”跨境通道建设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220页。
- ⑯ 李厚蕾:《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3期,第161页。
- ⑰ 张珩:《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国内有分歧 反对党:有争议但不针对中国》,(2016-12-27). [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12\\_27\\_386304.shtml](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12_27_386304.shtml).
- ⑱ DAWN. Dispute over CPEC is with Nawaz-led govt, not with China: Imran. (2016-12-25). <https://www.dawn.com/news/1304419>.
- ⑲ 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第30页。
- ⑳ Safdar Sial.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19: Security Landscape of Pakistan in 2019.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20:43.
- ㉑ 严天钦、石坚:《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政教关系对比研究》,《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第70页。
- ㉒ 张华琴、刘成琼:《巴基斯坦政治文化发展探析》,《南亚研究季刊》,2008年第2期,第85页。
- ㉓ Labbaik为乌尔都语词“ليبک”在英文中的音译形式,意思是“响应真主召唤的应召词”“遵命”“服从”等,因此,该政党也称“巴基斯坦响应真主运动”。

## 参考文献

- [1]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 [2]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3] Anam Fatima. Pakistan Security Report 2018: CPEC Security in 2018[R].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9.
- [4] Iftikhar H. Malik. Culture and Customs of Pakistan[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8.
- [5] Muhammad Amir Rana, Safdar Sial. Overview of Security in 2019: Critical 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J].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2020, 12(1).
- [6] Safdar Sial. CPEC in Balochistan: Local concerns and implications[R].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9.
- [7] 高柏, 甄志宏, 等. 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8] 胡键.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 [9] 李厚蕾. 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影响[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8(3).
- [10] 厉以宁. 文化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11] 钱雪梅.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J]. 世界民族, 2013(3).
- [12] 宋琪, 占绍文. 文化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 [13] 苏国勋, 张旅平, 夏光. 全球化: 文化冲突与共生[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4] 王旭.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A]// 郭业洲. “一带一路”跨境通道建设研究报告(201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15] 吴云贵. 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J]. 世界宗教文化, 1988(3).

## **Challenges from Pakistani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ZHONG Zhixiang KONG Liang**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is a concrete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s highly valued by both sides. Due to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and economy, Pakista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China in terms of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way of think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religious relations, resulting in many cultural challenges coming from Pakista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PEC. Only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earnestly can we address the challenges effectively and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the CPEC smoothly.

**Key words:** culture; influenc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